

晋绥革命根据地

# 教育史资料选编

(二)

山西省教育史晋绥边区编写组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史志办公室

设计 智效民

责任编辑 李明温  
岳新城

晋绥革命根据地  
教育史资料选编  
(内部资料)

出版：山西省教育史晋绥边区编写组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史志办公室  
印刷：太原宝色印刷厂

1987年5月印

晋绥革命根据地  
教育史资料选编

组 长 解玉田

副组长 郭福昌 赵美英

秦政奇 李明温

岳新城

成 员： 蒲丽萍 陈弘法  
赵 逵 贾新吾  
陈 联 刘 彪  
王运峰

# 目 录

## (三)

访革命老前辈杨植霖同志	(311)
访革命老前辈苏谦益同志	(319)
忆战争年代兴县的文教工作及其传统和作风	(324)
解放战争时期丰镇县各类教育概况	(333)
凉城县解放后各类教育的恢复工作	(339)
建国前清水河县的进步教育	(345)
晋西北抗战学院的诞生	(349)
成成中学校复校并改名为成成学院宣言	(351)
成成学院概况	(352)
成川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	(358)
绥蒙建国学院创办始末	(361)
抗战学院改为晋西北师范学校	(363)
晋西北师范学校剪影	(364)
晋西北民中四分校革命斗争史	(366)
迈进中的第二中学	(370)
晋绥边区第二中学简史	(371)
我们在新教育下成长	(378)
贺龙中学	(379)
贺昌中学简况	(383)
贺昌中学干部学习总结	(385)
解放战争时期的范亭中学	(389)
雁北公学和晋绥五中始末	(395)
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包头一些学校的活动	(397)
难忘的绥蒙一中学生生活	(399)
绥蒙第二中学创办述略	(406)
如何加强小学教育	(410)
巡视河曲完小教育工作报告	(412)
试谈小学教师应有的任务	(417)
略谈小学教员的学习	(418)

目前健全小学教育的主要困难及克服办法·····	( 419 )
谈晋西北国民教育中的几个问题·····	( 420 )
介绍一个小学的教学管理法·····	( 421 )
一个完小的教学管理·····	( 422 )
神府第一完小是怎样实施新教育方针的·····	( 424 )
介绍柳树沟民办学校·····	( 427 )
神府的公办小学与民办村学·····	( 429 )
加强教育工作的两点意见·····	( 432 )
我们如何自编小学课本·····	( 433 )
临县五完小的教学管理经验·····	( 435 )
介绍保德寨沟村小学·····	( 437 )
怎样办好民办小学·····	( 439 )
庙湾小学·····	( 440 )
谈谈怎样改进小学教育·····	( 442 )
我们是怎样教育与管理革命后代的·····	( 443 )
大青山抗日教育若干资料·····	( 445 )
记日伪时期我党在察右中旗几所学校的活动情况·····	( 448 )
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	( 453 )
大湾子村的抗日宣传学校·····	( 456 )
记乌审旗抗敌联合会蒙汉小学·····	( 459 )
山沟里的一所公立小学·····	( 463 )
革命战争时期老牛坡地区的小学教育·····	( 465 )
记保尔合少私立名言学校·····	( 472 )
刘澜涛同志在兴和县组织小教冬训班·····	( 477 )
忆和林县首批教师集训班·····	( 478 )
和硕公中垦区职工子弟学校·····	( 482 )
双池高小抗日学生连·····	( 484 )
集宁市小学教育发展概况·····	( 486 )
解放前卓资县教育概况·····	( 492 )
解放战争时期兴和五区南山教育概况·····	( 495 )
解放前和林格尔县的教育·····	( 497 )
介绍保德教协支会·····	( 501 )
保德县抗战期间检定小学教员的情况介绍·····	( 502 )
河曲少先队·····	( 504 )
武川县得胜沟教导队工作简况·····	( 506 )
抗日战争时期绥察行署的干部教育·····	( 508 )
新民主主义教育实验学校开学·····	( 511 )
用合作社形式管理伙食的尝试·····	( 514 )

实验学校二年间	(516)
绥蒙干部训练大队概述	(522)
晋绥行署成立干部补习学校	(524)
对今年冬学工作的几点意见	(525)
冬学宣传大纲	(527)
试谈目前冬学运动中的几个问题	(529)
冬学考试和竞赛办法	(532)
一月来的保德冬学工作	(533)
保德袁家里冬学转为一揽子学校	(536)
神府冬学的总结	(537)
临县实验冬学的几点经验	(540)
冬学和冬季工作是否有矛盾?	(541)
五寨总结冬学工作经验, 干部上冬学目的要明确	(542)
从实际工作中加强冬学教育	(543)
去年沙沟实验冬学的两点经验	(545)
丰镇县一九四九年的冬学运动	(546)
解放初期兴和县的工农教育基本情况	(550)

## 附 录

模范教师薛春圃	(555)
保德模范教员高钧斗	(556)
徐良明和柳树沟民办学校	(558)
郭振智与袁家里民办学校	(559)
袁佩章办好了炭峪沟小学	(562)
马仲清办小学的经验	(564)
荣誉军人张发奎的办学精神	(566)
武达平同志对教育事业的贡献	(568)
牛友兰与晋西北教育工作	(575)
贾武同志传略	(577)
刘进仁同志传略	(581)
我们敬爱的老师段允中事略	(586)
王玉芙同志在穆村、柳林等校进行革命活动的片断	(591)
王瑛夫妻和绥南抗日小学	(595)
记共产党员刘洪雄从事抗日教育的事迹	(597)
郭北宸烈士和东湾子小学	(602)
忆老共产党员刘桂清同志和她办的育仁小学	(608)
候德长同志传略	(614)
怀念穆村新民小学的两任教师	(616)

一个模范学生张辅国..... (619)  
 红色少年——刘儿..... (620)  
 一个虚心向上的孩子——吕二娃的模范事迹..... (624)  
 (“晋绥边区”的历史沿革..... (626)

(627) ..... 推大对高学委  
 (628) ..... 团四个儿的中队学学通月内  
 (629) ..... 团心委交味时读考考  
 (630) ..... 升工学多读尉的来员一  
 (631) ..... 对学于通一次拜学委里来致训司  
 (632) ..... 团通团学委训研  
 (633) ..... 团通及儿前学多能考具神  
 (634) ..... 团示示各委升工学多读考考  
 (635) ..... 团团要团目学委上请于，团通升工学多读考考  
 (636)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37)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38)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39)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40)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录 例

(641)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42)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43)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44)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45)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46)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47)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48)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49)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50)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51)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52)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53)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54)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55)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56)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57)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58)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59)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660) ..... 团通考委团中工工团通从



# 史籍留得庠序迹千秋犹记举高旌

## —访革命老前辈杨植霖同志

四月十八日晚，我们专程到达春意盎然、繁花似锦的甘肃省会兰州市，访问了担任中共甘肃省委重要职务的革命老前辈杨植霖同志。

杨植霖同志在他陈设简朴的书斋里热情地接见了我们。杨老衣着朴素，平易近人，虽然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但仍然是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对我们的来访十分高兴，对这次编修《晋绥教育史》也感到由衷的喜悦。

当我们向他问好致意，并将《晋绥教育史》（绥远部分）编辑室全体同志写给他的信交给他之后，杨老便和我们开始了拉家常式的谈话。

杨老谦虚而又热情地说：我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就接到电话，知道你们近日要来征集资料。但因为年代久远，有好多经历过的事情都记不清了，所以我努力回忆，你们也提供线索，咱们慢慢地从几十年来的斗争史料中，寻找对今天编修教育史有用的东西吧！

于是，我们就从“五四”、“五卅”、大革命到抗日战争谈起。

杨老首先忆述了大革命前后，即内蒙古各族人民解放斗争的初期，大青山地区的教育概况。他说：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炮声和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怒吼声，震醒了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亿万受压迫的人民，内蒙各族人民也不例外。而首先觉醒了的则是成千上万的大、中、小学生和教师。继之，则是亿万工人

和农民。所以，我们回顾这个时期大青山地区的教育史实，就总不能离开当时的学生运动（即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特别是我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而去孤立地谈教育。而当时的绥远，虽然处于边远地区，但总还不是世外桃源，更不是真空地带，“五四”运动的暴风骤雨也毫不例外地降临到当时的绥远地区，从而唤醒了绝大部分塞外的各族同胞。从此，大青山下、黄河之滨，千百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运动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纪元。当时，大青山下的归绥城只有三所中小学，它们是：南高、北高和归绥中学。南高，即土默特小学，因为它设在旧城的南端，故称为南高。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启运书院，创办于清初的一七二四年，一九〇七年辛亥革命前夕改为土默特高等学堂，一九一五年（即民国四年）又改为土默特高等小学。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蒙古族，当时在校学生约二百余人。在大青山下土默特旗的教育史上，土默特小学贡献极大，有着不可泯灭的功绩。它为革命先后培养了不少难得的人才，如在抗日和解放战争年代，直至解放之后一直身任要职的乌兰夫、奎璧、吉雅泰等同志，就不但是土小的学生，有的后来还是土小的教师。还有为革命牺牲了的李裕智、贾力更等同志，也是土小的学生。它为革命培养出的中高级干部就有四十余人之多。北高，就是归绥高等小学，因设在旧城北端，与南高相对而称为北高。至于归

绥中学则是内蒙地区历史最长的一所中学。它的前身是古丰书院，创办于一八八五年，一九〇二年改为归绥中学堂，辛亥革命后的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改称归绥中学。当时已有四个班，共约二百余名学生。

南高、北高和归绥中学的师生是声援“五四”运动的主要力量。“五四”爆发后，当北京蒙藏学校的绥远学生代表回到归绥，点燃革命的火把时，三所学校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他们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组织了归绥学生联合会，讨论了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行动方案。紧接着举行了罢课，走出校门，奔赴街头，进行示威游行。各校学生和部分教师还组成若干小组，手执小旗，分头上街宣传，用漫画、演讲、标语、墙报等形式，愤怒地、无情地、彻底地揭露了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一手操纵下的巴黎分赃会议（即“巴黎和会”）企图瓜分中国的罪恶阴谋，揭露了北京政府卖国求荣、背叛祖国的可耻行径，逐条、逐句、逐字地揭露与批驳了“二十一条”的反动本质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内蒙古虎视眈眈，妄图逐步吞并的滔天罪行。当时在这三所学校里读书的李裕智、刘洪雄、云泽（即乌兰夫）、奎璧、多松年、佛鼎、赵诚、吉雅泰、康根成等同学，就是这次学生运动中最活跃的骨干分子。

“五四”运动的烈火在归绥城燃烧了一个多月，其气势虽不及全国其它地区，但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此，这个地区的学生运动就逐渐壮大，逐渐向纵深发展，并以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到包头、萨县以及河套一带。它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整个运动的主要骨干力量就是青年学生和教师。如果没有南高、北高和归绥中学以及后来成立的西北职业学校、归绥师范学校师生的存在，上述运

动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开展。

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的第五个年头），归绥、包头等地逐渐有了我党的地下组织。这年的年初，就读于北京蒙藏学校的绥远蒙古族优秀青年学生李裕智、吉雅泰等人接受了中共北方局的委派，回到绥远组建了中共绥远特别区工作委员会，由吉雅泰担任工委负责人。其后，又在工委的领导下产生了土默特、归绥、和林格尔、武川、萨拉齐五个旗县的党的工作委员会。因为在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所以这些党的工作委员会就以“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公开的牌子作为掩护，进行工作，并且在吉雅泰等同志的亲自培养下组成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小组，秘密发展了第一批共青团员。一九二六年初，共产主义青年团北方区委派路作霖同志来绥远开展团的工作。他以新成立的西北职业学校的教师兼教导主任的公开合法身份作为掩护，进行秘密的共青团的工作，迅速地占领了绥远地区的教育阵地（主要是归绥中学西北职业学校归绥师范等中等学校），使团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这年夏季，党领导下的共青团北方区委又派来了特派员彭振纲同志配合路作霖同志进行工作。同年秋季，组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绥远特别委员会，由新入团不久的杨曙晓同志担任共青团绥远区委书记（当时路、彭二同志已任中共绥远省工委负责人），并发展了刘进仁等数十名团员。随之，又在集宁、丰镇、包头等地相继建立了团的组织。接着，在党直接领导下的“归绥学生联合会”也正式诞生，其办公室就设在归绥中学，而且它是个公开的组织。学联成立后，主要的工作是领导青年学生进行反帝爱国斗争，其中最具有影响的是一九二五年组织归绥学生声援“五卅”的运动。这个运动的规模之大，在绥远地区

是空前的，它迅速地蔓延到包头、河套、萨县等地区，而且由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甚至进入反动部队的内部，酿成令反动派惊心丧胆的兵运。

这个时候，我本人的年龄虽然还不小，但已经开始懂得一些道理了。记得那时由于“五卅”惨案引起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来到塞外甚至深入到农村的时候，有不少进步学生来我们村中（土默特旗什报气村）进行宣传，动员人们给上海工人斗争做后盾。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杨曙晓同志，他向农民进行演说，大人、小孩、妇女都爱听，鼓动性很大。但那些地主老财对他十分反感，他们散布什么：“国家大事，我们老百姓管得了吗？”并指责杨曙晓同志进行演说是“胡闹”，是“妖言惑众”，甚至公开出面干涉他的活动。我那时听了他的演说，十分激动，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就向人们打听这个青年人究竟是个什么人？村里人告诉我，他和吉雅泰是一个“派”的。吉雅泰同志（当时是绥远党的负责人）是三两村人，他的家离我村不远，又有个亲戚在我们村居住，所以常来，而且在我们这个村子开展了工作。村里的人们都说这个年轻人是个闹革命的人，当时我很想知道革命党究竟是干什么的，于是就同吉雅泰、杨曙晓等同志接近起来。我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此外，在一九二六年秋季，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归绥的青年学生王建华、贾力更等人，受中共绥远工委的派遣深入到农村进行工作，还在土旗兵州亥等地办过义务学校，进行义务教学，深受农民欢迎。一九二七年春，在归绥爆发的内蒙古革命史上著名的“孤魂滩事件”，也是在中共绥远地下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以归绥中学等中小学校的青年学生、青年教

师为骨干而进行的革命群众运动。记得当时的各个学校里的青少年学生已经普遍地会唱一些革命歌曲了，他们高唱着包括《国际歌》在内的革命歌曲，向前来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派冲锋陷阵，终于取得了胜利。当时我虽然年龄不大，但也参加了这次运动。

大革命时期，绥远各族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内蒙古早期的革命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不但是内蒙古大青山地区的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史，而且也是内蒙古大青山地区在党的直接与间接领导下，早期的教育史。

当我们问及有关呼市东郊保儿哈少小学的历史情况时，杨老激动而感慨地说：提起这个学校来，话就有些长了。这可是一所历史较久、贡献不小的学校啊！它在三十年代的一九三三年就诞生了，当时的校名是私立名言中心小学，校牌上写的是“归绥私立名言中心小学普及教育区”。总校先设在归绥城内，第二年迁到白塔附近的腾家营，分校设在保儿哈少等八个村镇。校长名叫李致芳，又名李世魁，保儿哈少村人，国民党员，是个国民党内颇具民主进步思想的进步人士。他是日本留学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主办过归绥农民协会，担任总干事，受我党的影响，为我们党做过不少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也是个地方实力派人物。我在十五岁那年（一九二六年），就在他的农民协会当过秘书，虽然管饭没有工资，但心情十分舒畅。当时另有一位秘书是个老秀才，搞个公文函件来往什么的是他的事，我记得他的笔下还有之乎者也一类的文言文。我的任务则是用现代的白话文写些痛斥帝国主义、军阀和地主等内容的宣言、宣传品之类的文字。

保儿哈少小学成立之后，李致芳是名

义上的校长，他利用自己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身份，每月从国民党绥远省政府领取一百元现洋作为学校的经费。当时的现洋十分顶用，再加上向各方募来的款项，学校的经济还不算十分拮据。在这所学校工作过的中共地下党员，陆陆续续的有王建功、胡泽润、王英杰、刘洪雄等同志，而且共产党员刘洪雄就是专管常务工作的副校长，实际上就是校长。因为李致芳将整个学校都交给刘洪雄和几位中共党员了，他本人每隔一至两个月才给学生讲一次话。我是后来才到这所学校教书的。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就是利用教师这个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地下活动的。这所学校对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中共党员教师们进行的革命教育之下，大多数青少年学生的头脑里种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种子。抗日战争开始后，这个学校向革命圣地延安输送了赵亮等十几名青少年学生（赵亮就是刘洪雄的弟弟，又名刘璧）。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我党的中高级干部。为什么这所学校的学生就有那么多人跑到延安参加革命？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是有其历史的根源的。因此说，保儿哈少小学对革命起过大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谁的学校为革命事业培养出了人才，谁的学校就是办好了。这所学校办到什么时候我记不清了，解放后我们党又恢复了这所学校。

当我们问起杨老曾在土旗毕克齐原归绥县四区当教师的那段经历的时候，杨老说：我曾经两度在那所学校教过书。一九二九年，我在北京清华大学受了立三路线的迫害回到绥远，在那个学校读过书。一九三一年被捕出狱后又在那里教书。在那个学校里，我看不惯当时归绥县四区区长刘子义的贪污腐化、敲诈勒索、道德败坏等行径（如他给一个人办了一件极普通的

事就敲诈了这个人一头骡子），就发动了将近三千人的农民队伍举行示威游行，在毕克齐三官庙的戏台前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慑于农民队伍的威力，不得不将他撤职了事。此后，我总是看不惯当时那里的歪风邪气而愤然离开。之后，我就到了保儿哈少小学当了教师（一九三四年夏秋，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

提到抗日战争开始后大青山地区的教育史时，杨老的表情十分严肃。他愤怒地痛斥了日本鬼子和汉奸特务破坏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罪行。他说：那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要处心积虑地、千方百计地灭亡中国，曾任日本首相的田中早已在向他的主子昭和天皇写的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里赤裸裸地说过：“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消灭满蒙”。试想，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全中国人民，包括满蒙人民在内，开口征服，闭口消灭，总的就是要亡你的国，灭你的种，当然就让你越愚昧越好。因此，在中国的国土上除了他办的进行奴化教育的学校之外，就不愿意再看见你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办的学校。所以，抗日战争期间，我们抗日游击政权在大青山地区敌我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日子，环境最艰痛、最特殊的日子，要想办正规的教育确实是不可能的。抗日战争时期，就全国来说，斗争环境最残酷、最艰苦的有两个地区：冀中地区和大青山地区。而大青山地区的条件比冀中还要差。我们在抗日战争初期在凉城县也曾经办过正规教育，但实践证明在当时办正规教育，客观环境是不允许的。

但是，中国人民的斗争锐气却并没有因为敌人的破坏而稍有减低。在那枪林弹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正规

教育虽然不能四平八稳地、成龙配套地办，但我们实际上还是办了教育，只不过是变换了一下形式和手段而已。在那个非常的时期，我们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地加强了大青山地区抗日游击政权的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它来代替正常时期的正规教育。在一九四〇年之前，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地委机关所在地的万家沟（也称大沟）就搞了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训练班，特别是党员训练班。这些不同形式的训练班尽管各有不同的专业性质，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提高各种训练班学员的思想文化水平。当时这个地区，不论是山区，也不论是平原地区，绝大多数年轻人的抗日热情都十分高涨。他们大批大批地参加了红色政权，但由于工作经验少，文化水平低，就不知道该如何搞革命工作。参加了各种适合自己工作专业的训练之后，文化知识提高了，专业技术提高了，斗争艺术与日俱增，起到十分良好的效果。一九四一年绥察行政公署正式成立，我担任主任，有一名叫曹振之的同志担任教育处长，当时他就专管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那个时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上的事情，他就比我清楚得多。在当时的《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第十三条里虽然也规定了搞正规教育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但那是我们的主观愿望，实际情况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上。谈到这里，我们征得了杨老的同意，将笔者从《大青山抗日斗争史》一书中找到的《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第十三条读了一遍。全文是：“十三、提高国民文化水平与民族自尊心，反对奴化教育与复古思想。健全各种学制，实施普遍的、免费的义务教育。优待小学教师及一切文化人才。努力发展农村教育，开展识字运动和社会教育，奖励成绩优良之教育人员。

设立各民族之学校，采取各民族的语言文字，讲授各民族需要之课程，设备、生活务求适合各民族之风俗习惯。”读完之后，杨老说：对，正是这样，当时我们的主观愿望是：不但要办好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而且还要办好正规教育。但因游击战争的情况特殊，环境特殊，抗日政权和抗日部队今天在东，明天在西，流动性极大，有时还要搞坚壁清野，所以正规教育暂时不能搞，只能搞适合形势的流动性大的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这样，我们当时的教育事业就不会受到敌人的破坏了。

杨老接着说：为了扩大行政干部队伍，提高干部的文化、业务水平和思想觉悟，当时的绥察行政公署经常在农村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并规定了干部的学习制度。为了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在政治学习方面学习《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全文，学习行署的有关法令、条例，以及陕甘宁边区与晋察冀边区的施政纲领，还学习《中国革命运动史》、《联共（布）党史》、《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文献和经典著作。学习这些东西，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是不行的，所以必须重视干部的文化学习，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而用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组织干部的文化补习，学习语文、简单的数学和珠算、中外地理和历史以及简单的自然常识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内容都是围绕和联系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个主题的。为了提高干部和战士的军事知识、军事素养和军事技术，特别是适应地区特点和形势需要的骑兵技术，行署还不止一次地举办了各种形式、各种类型的军事训练班，以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经过训练，我们的干部绝大部分人都具备了独立坚持工作的毅力和能力，有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有了在敌占区对敌斗争的能力和在根据地

搞行政工作的能力与会打游击的能力。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二年的—年里，绥察行政公署根据实际情况提拔了一批优秀的各级行政领导干部（共约八、九人），提拔的标准就有文化考核这一条。一九四二夏季又从各个根据地抽调了三十名干部，由行署开办训练班，培训两个月后，分别担任了副区长、科员和游击队指导员等职务。随后，行署又专门开办了好几期财会训练班、党政训练班等专业干部培训班，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党政军干部。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绥东获得解放，绥东地区成立了绥蒙政府，一九四六年在绥蒙政府所在地丰镇县的四城洼这个地方，办过一个比较正规的行政干部学校。当时我，是政府副主席，后来又是主席，还兼任了这个学校的校长，不过实际的行政事务工作是由一个名叫王修的同志负责的，我只是去作过多次形势教育的报告。这个学校的具体情况，因为年代久远而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总的印象是，培养出不少有用的人才。前年我去北京，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那个所的所长（名字记不清了）说他还是丰镇绥蒙政府行干校的毕业生。去年回内蒙到包钢的一个冶炼特种钢的厂子参观，那个厂的副厂长（名字也忘了）说他也是行干校的毕业生。总之，培养出了不少中高级干部，为解放后整个国家的四化建设输送了人才。这个学校一直办到一九四九年解放。

讲完了干部教育，杨老继续忆述了社会教育。他说：在抗日游击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抗日游击政权自始至终没有忘记老百姓，老百姓在最艰苦的斗争环境里也没有忘记让自己的子弟受教育。绝大多数的家乡父老经常这样说：我这一辈子成了目不识丁的睁眼睛子，这就不能提了，可再让咱们的下一代继续当文盲，于心何忍？的确是这样。从抗日政权领导人的角度来

说，让我们的青少年一代继续当文盲，更于心何忍？所以，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办正规教育虽然条件不太允许，但改换一下手法，普遍地大面积地进行社会教育，开展扫盲工作，这就是当时抗日游击区教育部门的主要任务。于是，我们就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提倡群众之间有组织地互教互学，进行识字教育。在敌我交错的地带，每晚由干部组织群众，名义上学珠算，实际上在学文化。那么，教材在哪里？由政工和教育部门的干部根据具体情况自己编。内容是宣传抗日，还讨论抗日战争能不能胜利的问题，批驳日本鬼子“中日亲善”、“满蒙一家”、“王道乐土”一类的胡说八道；特别是鼓舞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念，批驳日伪汉奸对抗日政权的各种造谣污蔑的鬼话，批驳某些人的“钻山溜洼还能赶走日本鬼子”的悲观论调，用事实进行对比，指出敌人所谓的“中日亲善”、“王道乐土”是些什么货色。如举敌人来抢粮的例子，说明中日亲善究竟是真是假的问题。此外，除（汉）奸、肃特（务），也是识字运动当中识字教材的主要内容。在这些教材当中，编写人员将汉奸、特务丑恶的嘴脸描绘得形象具体，活灵活现，使群众既识了字，对汉奸特务恨入骨髓，他们鄙视地说：这些狗日的汉奸特务，毫无人味，把祖宗的德姓也丢尽了。

在进行扫盲识字运动的同时，教唱抗日革命歌曲也是当时抗日游击政权政工人员的一个重要任务。在游击区到处都可以听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游击队之歌》和《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等歌声。老百姓（特别是青少年一代）通过学唱抗日歌曲，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念，大家都用实际行动来支援抗日，都表示誓死不当汉奸，甚至连一些地主也表

示：再灰也不能当汉奸啊！就这样，这个扫盲识字运动还真的搞出些成果来了。有不少青少年男女很快地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我记得在凉城县有个叫做杏树陂的地方，有不少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就由纯粹的文盲变成初通文化的“知识分子”了。还有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抗日政权就在青年民兵当中提倡“文武结合”，大家都在自己的脊背上写了字，让另外一个人来认。干部们还利用青救会、妇救会、农教会等群众组织的集会来进行识字教学。后来从实践中发现，背上写字，暴露了自己，容易让敌人识别，所以改变了形式，由公开进行识字教学，变为隐蔽地进行识字教学。再往后，由于形势的一度恶化，敌我斗争更残酷了，青救会、农教会、妇救会，暂时停止活动，但识字运动却一直坚持下来，虽然方式多变，但从来没有停止过。可惜当时的那些识字教材没有留传到现在，如果现在还能够找到那些东西，那该是多么宝贵的历史文物啊！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在教育上的方针、政策还是对的。通过识字教育，进行抗日宣传，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确实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那个时候在根据地的地主除了一户姓王的之外，都没有逃亡到敌占区去，即使是那个姓王的也并没有领上汉奸和鬼子来根据地进行骚扰。而且有不少地主还用粮食、草料支援了抗日。当时集宁有个叫刘玉的地主，现在是集宁政协的委员，我去年回内蒙时见到了他，还表扬了他，说他当年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是好事情，说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了他做的好事。你们说这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作用吗？这不是搞社会教育起的积极作用吗？谈到这里，杨老又十分感慨地说：当时通过识字教育进行抗日教育的又一个收获是：粉碎了敌人分裂蒙汉民族、破坏蒙

汉团结的罪恶阴谋，使敌人挑拨蒙汉民族关系的阴险目的一直无法实现，使敌人在这方面没有捞到任何油水。土旗有个蒙族地方武装力量的首领叫韩玉，他因为受了我党的影响和教育，逐步增强了民族气节。一九四〇年前后，国民党的队伍多次派人动员他带上全部人马投奔国民党军，日伪军也不断地对他进行拉拢，劝他入伙。但他多次拒绝了他们的拉拢，最后终于来根据地找到我，和我商谈这件事。我对他说：你不要听他们的胡说八道，你应该坚决跟上共产党走。于是，韩玉就在我面前饮了一碗酒（我的酒量小，陪着他少量喝了些），而后对天盟誓，表示坚决跟共产党抗日到底，决不投靠国民党，更不去投靠日伪军。后来，我们收编了这支武装力量，现在在内蒙政协的陈炳宇同志和内蒙第一毛纺厂的厂长（姓名记不清了），当时都在这支部队内部搞政治工作和民族团结工作。

总之，按照实际情况把社会教育和抗日宣传工作（主要是进行抗日前途教育，进行统战工作，贯彻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等等）结合起来，这在抗日的年代里确实是收到了一定的实际效果的。

讲完这些，杨老在略加停顿之后，就再用他谆谆的教导和细致的忆述将我们带到一个令人神往的境界里：当年从大青山下到延河之滨，一批又一批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蒙、汉族男女青年，在翻山越岭、极度疲劳之下，还欢歌笑语高唱《延安颂》和《抗大校歌》投入革命母亲的怀抱的情景又再现在我们的眼前。杨老说：当时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在进行干部教育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向延安的党中央输送革命的新鲜血液。这就是将游击区的进步青年分期分批地保送到延安学习。当时奎璧同

志负责搞这项工作，立了大功。由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我们从大青山地区送到延安的进步青年前后有一百余人。当时赴延安学习的人我记起来的有潮洛蒙、奇俊山（奎璧同志的侄子）、云曙先、云曙碧（乌兰夫同志儿子、女儿）以及王永年、朱玉珊、云治安、云照光、云世增、巴增秀等人。还有，曾任内蒙妇联副主席的云曙芬同志也是那时去的，而且连她母亲也动员去了。开始她母亲不愿意去，她用了一句土旗土话中的歇后语幽默地对母亲说：咱母女二人如果不走向延安这条道路，就真是疥蛤蟆晒暖暖哩，一亮一对子（意思是：坐以待毙，没有出路，将要走上危险的道路）。最后，她母亲终于接受了她的意见，母女二人同时到了延安。现在这些人大部分成了党的中高级干部，如奇俊山同志就是内蒙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谈到这里，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您和苏谦益同志给蒙绥旅延同学写过一封信，并且在经费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给旅延同学寄去了一千元钱，让他们买些零用物品等使用。有过这样一件事吗？杨老说：有过这样一件事。当时我正在领导动委会的工作，也正在搞抽调大青地区进步青年赴延学习的工作。到了延安的青年学生有的进入抗大学习，有的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我们给他们写信并寄款，是为了鼓励大家安心学习，准备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我们征得了杨老的同意，回到呼市之后，从《内蒙古青运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上找到了这封信的原文（此篇历史资料现藏于内蒙古档案馆），附在本文之末，目的是让今天的广大读者从中受到教育。

接着，杨老谈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红色政权在绥东一带办的正规教育。他说：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原来的绥东六县全部

解放，这六个县是丰镇、集宁、凉城、兴和、陶林、卓资，还有武川的东部。这个时候，绥蒙政府成立，虽然国民党的部队还经常来骚扰，但环境与条件比日伪时期好得多了。因此，就有条件办正规教育了。就在这时，丰镇、集宁都办了正规的中小学，集宁还办起了师范学校，一般的乡都办起了完全小学，我记得集宁的西南有个麦胡图乡，那个乡的学校规模还不小，学生也不少。当时丰镇中学的校长是冀丕扬同志，绥蒙政府负责管教育工作的是武达平同志，你们回去之后可以找他们谈谈这个时期那个地区的正规教育的情况。

介绍完这部分史实之后，杨老又想起一件往事来，他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还有一些非党群众为了抗日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记得察绥行政公署成立之后，曹振之同志是教育处长，还有一位党外的进步人士（姓名忘记了）和曹振之同志一块儿搞教育工作。后来，他在后山武川一带不幸被日本鬼子俘虏了，敌人用尽各种酷刑和威胁利诱的手段都没有使他屈服，最后英勇牺牲了。这个人你们回去之后一定要调查一下，应该将他追认为革命烈士，很好地表彰一下。我虽然忘记了他的姓名，但一直没有忘了他这个人 and 这件事。这时，我们又问杨老：有位武川县敬亭乡大湾子村的王明亮同志您认识吗？杨老说：有这样一个人，认识。当我们告诉杨老王明亮同志知道这位为党的事业牺牲了生命的（搞教育的）党外人士的姓名和事迹时，杨老十分高兴，他连连说：这太好了！对革命有过贡献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党员，我们都不能忘掉他！接着，我们又向杨老询问了当年游击根据地得胜沟举办教导队一事。杨老说，办过，因为是老根据地，敌人不容易来，所以办的时间

（下转第338页）



# 深情的回忆 殷切的期望

——访革命老前辈苏谦益同志

陈 联

张志耀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笔者专程前往北京，访问了曾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担任领导职务、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工业学院顾问的革命老前辈苏谦益同志。

盛夏的京都，骄阳似火，天气十分闷热。我们下车后，稍作休整，就给北京工业学院党委办公室挂了电话，结果很快得到答复：六月二日上午，苏谦益同志在北京工业学院接见我们。专访苏老竟是这样地顺利，使我们忘记了旅途的疲劳，沉浸在喜悦之中。

六月二日上午八时三十分，我们乘车赶到北京工业学院。院党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领着我们走进苏老的办公室，苏老正在埋头看文件，看到我们进来，起身相迎，和我们一一握手。苏老衣着朴素，和蔼可亲，操着一口浓重的内蒙古家乡口音对我们说：你们不远千里来到北京，一路辛苦了。寒暄之后，我们把《晋绥老解放区教育史》编辑室全体同志的信递给了他。看过信后，苏老高兴地说：编写教育史志，总结历史经验是一件大事，你们的工作很辛苦，也很有意义。

我们请苏老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在大青山游击根据地领导的学校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情况，苏老稍加考虑，便热情洋溢地和我们谈开了。

苏老首先忆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青

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艰苦环境。他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均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我是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同王建功、成枫涛、扬国兴、靳存智等同志一起，被晋西区党委抽调上了大青山的。上山后，我担任绥察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并兼民政处长。大青山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开展的。当时的抗日民主政府从区政府、县政府、专员公署直至绥察行署，实际上都是一支游击队，各级政府人员都是游击队员。那时候，我们几乎天天都要行军，天天都要转移，在一个地方住两三天，也是少有的。因此，政府的一切工作，如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宣传工作、教育工作、瓦解敌军、动员征收抗日物资等，都是在紧张的游击活动中进行的。

处在这样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中，要想四平八稳、正正规规地办教育，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怎么办？环境艰苦，暂时不允许我们办正规的学校教育，我们就重视和抓紧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在这方面，我们有一套自己的做法，即不脱离大青山游击区的实际，不照搬其他根据地的做法，适应大青山游击战争的需要，在高度游击活动空隙中开展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当然，这样的认识也是在艰苦的游击战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